

法国文学 理性 批判精神

de

从拉伯雷到
萨特

艾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

艾 珉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L'Esprit critique de Raison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 De Rabelais à Sartre —**

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

——从拉伯雷到萨特——

艾珉 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92 千字

1991 年 4 月第一版 199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 2,500 册

ISBN 7-301-01459-7/I • 239

定价: 4.60 元

序

文学也真怪，它作为对象，往往会摆脱被动的地位，反过来撩拨一下主体的情感，有时竟使主体狼狈到像一个被猎物反咬一口的可怜的猎人。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得不跟他的人物苦乐相随，歌哭与共，这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不消说了；批评家再怎样自以为客观而公允，他在冷峻的褒贬或扬抑中，都难免流露出欲盖弥彰的好恶，即使被诟为“偏激”也在所不惜。看来，与经不起主观干扰的科学工作相比，“笔端常带感情”大概是文学工作的一个近乎规律性的特征吧。不过，也有三种例外——

那就是文学史家、教授和编辑的工作。这三种工作者同样以文学为对象，在各自的本行中却严格按照文学史的客观需要，来阐述、来讲解、来编印公认值得一提、一讲、一出的人或书。品藻古今之间，力求持平、稳妥而又具有最大说服力，尽可能避免其实难以避免的个人好恶——乍看之下，似乎对所有对象一视同仁，无所不爱；同时也可以说，他们冷静得一无所爱。难道他们的工作竟不需要热情了吗？当然不是，没有热情是任何工作也做不成的。看来只能说，与其他方式的文学工作相比，让自己的热情服从于本职工作所需要的科学性，虽然前者并不必然与后者相对立，才是这三种工作的一个近乎规律性的特征。

本书作者就是上述三种工作者之一，她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法国文学的编辑业务。十余年来，按照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她组译和编发了一系列法国名著，成绩斐然可观，尤以卷帙浩繁的《巴尔扎克全集》中译本的问世值得称道。同时，作为法国文学研究

者，她还写了不少有关书稿的评论文章，从另一方面为她的编辑业务增加了广度和深度。将这些文章加以删汰，去粗存精，保留她认为足以反映个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便是这本文集的缘故。

浏览一下也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特征所体现的优势在本集中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罕见的耐人寻味的批评风格。一方面，和一般文学工作者一样，作者对于自己所评的对象，无不倾注了发自深切理解的热情，又无不显示了从热情油然而生的是非感和倾向性，以及一些经过艰苦探索得来、不愿轻易放弃或隐瞒的独到见解。这就使她的手笔迥然不同于四平八稳、三句不离教训口吻的“前言、后记”之类，而视阅读为精神体操的读者才会从心灵深处同它直接相呼应——即使未必同意其中某些观点，你也会为她在这些观点中所表现的执著精神所动。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学编辑，作者仍然自觉地坚持从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出发——说来说去的“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又是什么呢？想必是指不仅应当着眼于文学的本文(text)，同时更要注意到它的上下文(contexte)。这就是说，文学史应当帮助读者不仅知道个别的什么人写了个别的什么诗篇、小说或剧本，更要知道这些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之下、为什么力量所驱使而写成的，它们和传统是顺向的还是逆向的，是受古人或同代人的影响还是独来独往的创新者，以及它们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整体成就中各自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进一步还应当帮助读者从这些个别的文学现象引证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学性格，反过来再根据这个总体性格重新检验原来未必熟识的个别现象，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而又有声有色的文学观。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解答这些问题，正是文学史的客观需要。符合这种客观需要的文学评论，势必是一种严谨的经得起辩难的科学研究，决非时下一些凭借主观随意性反映复杂现实的“文学评论”所可比拟。——本书作者正是试图这样开展她的法国文学研究的。她的这本文集不但“笔端常带感情”，而且正是试图从文学史的全方位

出发,引导读者更广泛地探讨法国文学,在探讨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法国文学以及人类生活本身的丰富多样性。

法国文学在我国据说拥有最多的爱好者,他们大致都会知道,它作为罗马文化的后裔,在中世纪既有过视爱情如生命的行吟诗人,又有过歌颂视死如归、敢向上帝扔铁手套的勇士的《罗兰之歌》;从文艺复兴经启蒙运动直到十九世纪前夕,先后在散文、诗歌、戏剧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灿烂的明星,他们永恒的光辉从悠远的天边一直照射到今天,如维庸、拉伯雷、蒙田、莫里哀、帕斯卡尔、狄德罗、卢梭等;到十九世纪,在散文、诗歌之外再加上批评,更有数不胜数名流和显学,使它至少在欧洲文坛执牛耳而无愧;而在二十世纪,它更是西方文学各种新奇玩意儿的实验室,哪一种先锋派不是先在这里酝酿成熟而后问世的呢?但是,所有这些斑驳陆离的现象,在不少人充其量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到了本书作者眼中,却逐渐呈现出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即“文艺复兴以来贯穿其文学主流中的理性批判精神”的传统。她在后面一篇文章中,排除了仅仅认为法国人“幽默、机智、浮华、浪漫”的浅见,提纲挈领地指出,不满现状几乎是法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不断地反传统几乎成为法国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正是以批判为灵魂: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是理性批判占主流,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则转向非理性批判,而从整个文学史来看,理性批判才是法国文学最富于活力、最有生命力的精华所在;这种理性批判精神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在文艺复兴时期反对过神权,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反对过君权,而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末则反对进一步使人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四百年来,从拉伯雷到萨特,法国作家一直是以人的价值与尊严是否得到承认、人的聪明才智是否得到发挥为尺度,来衡量任何社会制度是否合乎理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紧接着这番高屋建瓴的宏观观察,作者还有一段更其精彩的议论:

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愈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蒙时代是叱咤风云的大写的‘人’；十九世纪前期，在斯丹达尔、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十九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写平庸的人；十九世纪后期，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两次世界大战更将人们抛入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迷惘和惶恐之中。……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感和屈辱感的反映，对某些作家说来，不失为一种抗议的手段。……但消极悲观从来不能成为法兰西性格的主流，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精神危机中，出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母与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精神危机中，出现了萨特的《恶心》、《苍蝇》和《魔鬼与上帝》……罗曼·罗兰在作品中召唤人们以坚毅乐观、自强不息的个人奋斗精神与逆境搏斗；萨特则运用无神论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论，召唤人们以自己的行动去确立自身的价值。……他们都希望提倡一种较积极的人生观，吸引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打开一条出路，尽可能在社会的污泥浊水中保持人格的尊严和独立，以期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迄今为止，还很难见到什么评论，这样大处着墨地满足了前文所说的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如此入木三分地说明了法国文学的本质性格和本质力量。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将这段议论照抄下来，正是因为从中不仅见出作者对于法国文学的热情和造诣，更觉得这个关于“人”的贬值及其自强不息的观点，似乎超出法国文学而涵盖整个西方文学，为我们曾经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提供了重新探讨的角度和途径。照说集中这篇《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本来就是本集的一篇堂堂正正的序言，又何须由我多事而饶舌呢，如果不是我另外还有几句题外话想说。

多年来在出版界流行一个说法：我们是编辑，编辑不是作家，把书编好出好就够了，用不着写什么文章，对书稿说三道四。这番话如果针对某些不安心编辑工作者而发，也许不无意义；但如果满

足于按行情定选题，向名人组稿件，稿件到手则忙于“圈圈点点，镶牙补眼”，做到（甚或做不到）“通顺”二字就发排大吉——那么，这个说法便无异于企图掩饰自己的业务意识的浅陋，何况有些人连自己编的书稿是不是真正读懂了，也还说不准呢。法国的狄德罗就是编辑，中国的纪晓岚也是编辑，那些位大方之家且不去高攀了；单看本书作者作为文学编辑，恰好同这个说法相反，她不仅在选题方面力求从文学史本身来满足读者尚不自觉的需要，在组译方面力求形神兼备地对得起原著，更重要的是，书稿成熟只算完成了她的编辑业务的一半；她在发稿以后更关心如何帮助读者深入地理解原著，如何扩大原著在读书界的积极影响，以及如何缩短我国文化积累的应有目标和实际进程之间的差距——甚至可以说，发稿以后的评介工作（不论是自己动手写还是组织别人写）才是她的编辑业务的重点所在。足见，这本文集还可以告诉人们：在本来的意义上，应当怎样才算得上一个胜任的文学编辑。不过，环顾今天的出版界，又不能不叹息：这样胜任的文学编辑人才越来越稀有了，倒是那种随波逐流、急功近利、唯短期行为是务的编辑作风大行其道，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近又传闻，出版界隐约有了一点转机，但好书还远没有脱离难出、难买的窘境。这本文集编竣，原稿在作者的抽屉里躺了许久，终于由她的母校出版社慨然出版，毕竟令人欣慰。我平日欢喜读她编的法国作品，又欢喜读地为它们写的文章，她愿意我为这本文集说几句话，我是义不容辞的。忍不住把一些不必说的话说了一通，无非属望读者面对过眼云烟似的出版物，幸勿为各种迷彩所惑，以致错过这本好书，一个将从心灵深处与你相呼应、却无意为你装门面的朋友。

绿 原

1990年9月23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绿 原
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	1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	
——漫谈《巨人传》的思想和艺术	7
狄德罗美学思想浅析	32
生气勃勃的理论著作	
——读《雨果论文学》	58
法国短篇小说巡礼	64
《红与黑》的魅力	83
文学领域的普罗米修斯——巴尔扎克	96
纷繁而集中 丰富而凝练	
——《高老头》艺术琐谈	106
资产阶级的胜利进行曲和贵族阶级的挽歌	
——读《欧也妮·葛朗台》和《古物陈列室》	119
《幻灭》——一代青年的悲剧	132
十九世纪的摩登强盗	
——读《十三人故事》	152
充满辩证法的小杰作	157
一部貌似荒诞的现实主义小说	
——读《驴皮记》	160

活泼潇洒,独具一格	
——读《缪塞戏剧选》	170
从《塔曼戈》看梅里美的艺术特色	173
“客观性艺术”的范例	
——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	181
法国文坛上的一颗流星	
——莫泊桑及其《一生》、《漂亮朋友》	195
洛蒂的海	
——漫谈《冰岛渔夫》	214
奔向光明的激流	
——读罗曼·罗兰的《母与子》	221
盖棺且莫论定	
——关于萨特之我见	227
后 记	241

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

我之喜爱文学，最初不过是好奇心使然。文学作品展示了许许多多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让我看到了个人视野之外的偌大世界。待年龄稍长，多了些阅历，便体会到文学原是本民族的心灵之窗，大凡有传世价值的作品，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写出了当代民族之魂的作品。我喜欢透过文学作品探究一个民族的气质，触摸一个时代的脉搏。我喜爱俄罗斯文学中沉郁的热情、韧性的力量和辽阔舒缓的韵致；欣赏德国文学中丰富的想象力和永恒执著的追求，赞叹美国文学中新大陆的开拓者那种明快大胆、一往无前的创业精神，……那么法国文学的独特魅力是什么？是法国式的幽默机智？是人物塑造的鲜明生动？是法国人的善说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这些可能都是它的特色，但我以为真正使之形成强大磁场的，首先是文艺复兴以来贯穿其文学主流中的理性批判精神。

许多人认为法国人浮华、浪漫、放荡不羁。的确，较之俄国人的深沉、英国人的持重、德国人的执著、高卢人的后裔似乎显得轻佻、浮夸、缺乏分寸感。但是，他们深刻的睿智使人惊讶，敏锐的眼光令人叫绝。这个天性快活，时刻不忘寻欢作乐的民族，表面上玩世不恭、嘲笑一切，其实具有健全的理智，遇事都有清醒的思考与分析；他们貌似轻浮，却能在大灾大难面前保持潇洒的风度，以轻松的笑谈来冲淡痛苦。拉伯雷的《巨人传》、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对高卢人这种别具特色的性格作了生动形象的概括，谁若不了解法国人隐藏在荒唐面具下的严肃，浮夸外表下的深刻，玩世态度掩盖下的顽强意志及非凡的勇气，谁就无法理解法国文学。

法国人思想活跃，不安于现状，不断地反传统，几乎成了法国

文学的传统。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如果墨守陈规,不能在某个方面超越前人或在艺术上另辟蹊径,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位大作家或大艺术家,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近现代西方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多是由法国发端,然后推及欧美两洲。由此也不难理解,法国诸多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尽管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千差万别,却大都以批判为灵魂。不仅现实主义艺术如此,浪漫主义乃至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和二十世纪的荒诞派戏剧,也无不具有批判的内涵,只是批判的角度、性质各各不同,有理性主义的批判,也有非理性主义的批判。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占主流地位的,是理性主义的批判,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逐渐转向非理性主义的批判。无论来自何种角度的批判,总之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实几乎是法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在法国文学中可以找到歌颂理想或歌颂历史的作品,却很难找到一部歌颂现实的作品,现实永远只配受批判。但这不等于说法国人真的与自己的国家势不两立。实际上法国人很为自己这个民族骄傲,为他们光荣的 1789 年骄傲,为拿破仑的丰功伟绩骄傲,为他们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为他们的时装、香水、奶酪、葡萄酒……骄傲,然而任何伟大的人和事,都无一例外要受到当代人的猛烈批判。不过非理性主义的批判往往令人陷于悲观颓废,理性主义的批判则极力唤起人们的自信心和历史主动性。所以我以为理性的批判始终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活力、最有影响、冲击力最大、生命力也最强的部分。

法国人心目中的“理性”,究其实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出的“人本主义”。如果说东方文化的基础是“人伦”观念,西方近代文化的基础则是“人本”观念。这一观念原是针对中世纪的“神本”观念提出的,恰是统治欧洲达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化的逆反效应。西方的封建统治阶级为迫使人民安于受奴役、受压迫的命运,利用基督教的“原罪说”来束缚人的灵魂,让人们相信自己生来是为了“赎罪”,只有通过现世的忏悔、苦修和受难,求得上帝的宽

怨，死后才能升入天堂，获得永生的幸福。“神”的统治窒息了人的自我意识，把天地万物中最富创造力的生灵，变成消极无为，听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直到十四、十五世纪，随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被发掘，新兴市民阶层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复兴古代文化的口号下，提出了“人为万物之本”的新观念，才奠定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基础。

文艺复兴是欧洲资产阶级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些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的先进思想家，以新兴阶级的青春锐气，大胆地以“人”来对抗“神”，以肯定现世幸福来对抗苦行主义、禁欲主义及基督教关于来世的许诺；以歌颂人的智慧、鼓吹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文化来对抗蒙昧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开始，继而传到德国、法国、英国。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于十六世纪形成高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拉伯雷以其五卷本长篇讽刺小说《巨人传》综合了整个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拉伯雷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巨人”形象来体现人的力量、尊严与价值，体现足以与“神”相抗衡的“人”的理想形象。从此，人的尊严与价值能否得到承认、人的聪明才智能否充分发挥，便成为衡量社会制度是否合乎“理性”的尺度和标准，同时也成为近代法国文学的基本命题。四百年以来，从拉伯雷到萨特，从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到二十世纪的无神论存在主义，都没有离开这个基本命题。围绕这一命题，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充分显示了高卢民族清晰的思辨能力，鞭辟入里的批判精神和犀利、俏皮的讽刺才能。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只是“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矛头仅仅指向教会，而没有明确的反封建纲领。那么，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面宣战。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们一样，都是一些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对中世纪的一切观念形态展开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这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小

的阶级队伍，具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不再像十七世纪太阳王时代那样，需要在王权庇护下谋求自身的发展，而是希望与贵族阶级分庭抗礼了。于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明确地将矛头指向君主专制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特权。由于法国封建社会的一切世俗权力都以神权为支柱，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必然以对宗教的批判为中心内容。所谓“理性”即反对一切宗教偏见和迷信，把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的能力与权力归还给“人”自身。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教士一直是法国文学嘲弄的对象，天主教教义的荒谬和教会的黑暗、腐败被揭露得痛快淋漓。

法国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延续了约半个世纪。这一过渡阶段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反映在文学上则是围绕“人的命运”这一主题的多元化矛盾。一方面，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封建的等级门阀观念仍然存在尖锐的冲突；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金钱取代“神权”和“君权”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非常革命的观念，与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正当人们试图向新制度索取“理性王国”曾允诺的一切权利时，却发现无比高贵、尊严的“人”正在沦为“商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在实践中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角逐。幻想破灭了，人们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地置身于一个以金钱为杠杆的动荡不安的社会。宗法制的从属关系瓦解了，人们只能凭借个人力量在这浊浪滚滚的社会中挣扎、拼搏。民族史诗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个人的史诗，每一个被排斥在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人都对这个非正义、非人道的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整个十九世纪文学，基本上都是描写这种与社会对立的个人。法国文学史上因而出现了丰富无比的人物画廊，塑造出无数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个性。

“理性王国”破产了，而作为“理性”尺度和心理基础的“人本”观念依然存在。十九世纪的作家们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围绕形

色色的个人命运,对现存秩序展开了猛烈的、多角度的批判。于是我们从巴尔扎克等前期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暴行、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关系、竞争的残酷、金钱的败坏人心、法律的不公、政客的低鄙、文化的堕落、天才的被毁灭、恶棍们的胜利;……于是我们从左拉等后期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繁荣如何掩盖着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腐朽堕落和劳动者非人的生活处境;……总之,资产阶级赖以反封建的思想武器,现在完全可以用来否定它自身。资产阶级愈是接近它的全面胜利,资本主义秩序愈是巩固,人们感到距离“人”的理想愈遥远,“人”愈来愈失去自己的本质,变成了物的奴隶、机器的附属品。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愈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蒙时代是叱咤风云的大写的“人”;十九世纪前期,在斯丹达尔、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十九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写平庸的人;十九世纪后期,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愈走向世纪末,人的形象愈委琐、渺小,两次世界大战更将人们抛入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迷惘和惶恐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非理性的悲观主义哲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文学上则是颓靡之风盛行。人们既厌恶自己的处境,也厌恶“人”本身。理性主义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人本主义”似乎悲剧性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然而实际上,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感和屈辱感的反映,对某些作家说来,不失为一种抗议的手段。惟其追求崇高,才痛感其丑恶、渺小;惟其向往有所作为,才痛感自身的无能为力。但消极悲观从来不能成为法兰西性格的主流,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精神危机中,出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母与子》及一系列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戏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精神危机中,出现了萨特的《恶心》、《苍

蝇》和《魔鬼与上帝》……罗曼·罗兰在作品中召唤人们以坚毅乐观、自强不息的个人奋斗精神与逆境搏斗；萨特则运用无神论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论，召唤人们以自己的行动去确立自身的价值。无论这两位大作家的哲学思想和具体论点有多大差异，本质上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观念一脉相承。他们都希望提倡一种较积极的人生观，吸引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打开一条出路，尽可能在社会的污泥浊水中保持人格的尊严和独立，以期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无可否认，基于“人本”观念的理性批判精神，在法国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没有“人”的思想解放，就没有现代生产力的解放；没有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没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且时至今日，个人的尊严感和价值观仍是西方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极活跃的精神因素。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工作上的责任心是自尊心的表现，一个人的创造性是他的价值的体现，而现代科技的飞跃则有赖于每个人的潜能及价值的充分发挥。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以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为主要内涵的“人本主义”无疑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但在西方，这种观念与利己主义并不是等同的概念。利己主义被认为与群体利益不能相容；人的尊严与价值则被视为人的基本权利。社会公共道德要求人们尊重和承认他人的人格与价值，也要求他人尊重和承认自己。而在社会生活中想要实现这一原则谈何容易，矛盾斗争是不言而喻的。没有这层出不穷的矛盾斗争，就很难想象数百年来西方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也无从理解近现代西方文学艺术的灵魂。

1990年4月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

——漫谈《巨人传》的思想与艺术

有一些作品，如果离开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就无法理解它的内容和深意；如果离开产生它的民族土壤，就无法鉴赏它的艺术价值。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也和理论思维一样，“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

拉伯雷的《巨人传》，如果撇开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兰西的民族特性不谈，而将它拿到某种理论的达马斯忒斯铁床^②上去度量，简直可以贬得一文不值：连篇的疯话，满纸的秽语，层出不穷的市井笑料……这算什么文学！纯粹是胡言乱语！

但是，请注意作者为《巨人传》撰写的前言：“读了我杜撰的这些令人捧腹的标题……如不深入了解，通常是会被人当作玩笑和开心话看待的。”其实“本书内容所论，并不像封面标题所示，一味胡说八道……必须在乍一听来仿佛寻开心的话里，进一步探索其更高深的意义。”他奉劝读者“把我这脂厚味深的好书加以仔细的咀嚼、赏玩、钻研，然后，通过反复的诵读，再三的思索，嚼开它的骨头，吮吸里面富有营养的精髓……”，“因为，在这本书里你将找到

* 本文原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1983年。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② 达马斯忒斯是希腊神话故事中的拦路大盗，他有两张铁床，一张很长，一张很短。他将矮个儿过客领到长床上，把矮个儿拉长直到气绝而死；遇到高个儿过客，则领到短床上，把他们从床上伸出的半截腿砍掉。